大家小品

拾荒孩子的幸福

曲 近

对于幸福的理解与感受，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环境而异。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幸福感并不是一些有钱或有权人的专利，人人都应该享有幸福的权利。以前曾对幸福感一说有些自己粗浅的认识和看法，但都未从细微之处去认真体察琢磨，只做过粗略的分析，直到有一天，从一个拾荒孩子脸上读到了幸福和满足，才迫使我进入深层思考。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在深圳海岸公园的海堤边，看景、拍照、漫步得有些累了，再加上和煦阳光的暖意，春风拂面的清爽，让人产生了慵懒的感觉。于是，找一条长凳坐下，一边观察眼前海浪的变化，一边欣赏海边红树林里鸥鸟的舞姿。无意间，目光向前伸展，便能触及到不远处林立的高楼大厦，不用问，那便是繁华世界香港了，它与深圳一水之隔，直线距离很近。早些年，这边时有偷渡事件发生，因为两块土地上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而且经济状况对比反差很大，所以就有人冒险偷渡到那边。如今，远看对面的香港，已不再想象那是一个花花世界，只感到那是一大片高楼的森林，密不透风的钢筋水泥建筑群，路上行驶的汽车，小如蝼蚁，缓慢地蠕动着。

视觉疲惫时，收回目光，忽然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单薄而瘦弱，发育得不怎么理想。一看，就是来自农村的流浪少年，他肩上搭着一个蛇皮袋子，里面鼓鼓囊囊已装了不少东西。夕阳使他的影子先于身体进入我的视线，很快就从眼前走过。这孩子尽管瘦弱单薄，但蛮精神的，脸庞被海边的太阳晒得黑里透红，也算一种健康色。因为瘦弱，行动比较敏捷，轻快地穿行于游人之间，不时弯腰捡起别人遗弃的空易拉罐，但更多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总是落在间距不远处的垃圾桶里。

也许是无聊，也许是其他原因，我的目光竟然像追光灯一样，开始一刻不离地追随着那瘦弱的身影移动，把他罩得牢牢的。认真仔细地观察他走路的姿势，他弯腰的动作，他捡拾别人随手遗弃物的速度，还有他的变幻不定的神情。这孩子手脚麻利，动作机敏，眼睛有神，属于勤快的孩子一类。我始终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出现在深圳的海边，要知道这个年龄是应该坐在教室里读书的，不应该自己过早地出来讨生活的啊。或许，他的家庭遭遇了什么不幸的变故，成为孤儿，只身流浪到城市，以拾荒度日；或者，就是想早早独立支撑门庭，到外面挣钱补贴家用。总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他像一条游鱼灵巧地在游人之间穿梭，眼睛总盯着别人手中的易拉罐或矿泉水瓶子，于别人顺手丢弃的瞬间，飞快地奔过去，迅速捡起来塞进袋子里。每当这个动作完成时，我发现他的脸上溢出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幸福神情，我相信，他将瓶子装入袋子的那一刻，感到非常的幸福和满足，甚至有一种成就感。尽管他这种幸福感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但他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快乐，那快乐就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有一次，我被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所惊动，他更敏感，已经紧紧跟在声源的后面了。哦，原来是海风吹过来一只滚动的红牛饮料空罐，铝皮罐被风吹着在水泥地上滚动，发出很清脆的响声。由于风大，空罐滚动得较快，他抓了几次才抓住。那一刻，我轻易地就捕捉到了他脸上心满意足的幸福感来，这对我触动很大，几乎令我感到震撼，禁不住对身边同伴说，你瞧他，一个捡荒孩子一脸的幸福啊。同伴很有同感地说，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自己感到满足就是幸福。是啊，一个有钱人，吃一顿大餐或者赚到一笔钱是幸福的；一个科学家，完成了一项发明创造是幸福的，那么，一个拾荒孩子捡到一个能卖一角钱的空瓶子同样也应该感到幸福。幸福的标准不在价值，而在感知。富人有富人的幸福，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价值不同，但快乐的感觉却是一样的。

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仍然忘不掉那个在深圳海边拾荒孩子在捡到一个空瓶子时脸上一刹那所荡漾出的幸福感，他让我思考了很多，也很久。

深谷春韵（国画） 杨树玉

现代诗坛

王小平的诗

烟花

让寂静更寂静
让荒凉更荒凉
让黑暗更黑暗
我恐惧的爱情
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燃放

我如何能制止我的灵魂
让它不向你靠近？
我怎能让它在黑暗中静躺
——反正最后任是谁都会在寂静的
地方被遗忘
那里不再有光，如果你的眼睛光芒暗淡
那里不再有飞翔，如果你放弃翅膀
可是一切呵，凡是冬天中所有光
——奇怪，能照亮你的总是同时把我照亮
好像你是火把我就是烟花
如果可能，花朵同时在我们身上开放
然后我们乘着冬天的风上升
黑暗中是谁给我们装上翅膀
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在虚无的宇宙里
星群闪亮

腊梅

我爱你　和我一起出生的孤独花朵
与你的相惜中　我得以成熟

你是我广大的乡愁　挥之不去
你是森林　我从未走出
你是冬天　我每一年这一时刻都会飘雪
你是黑暗中的网
每一个腊月出生的人都会坠入

在你开始我们的那一日
你无限骄傲地开始自己
我们成长在你的花香里
广布四野　风骨独异
于是你在寒风、清霜和冰凌中
独自完成自己

你是我最好的友人　默然不语
你是我最亲的爱人　我从未远离
你是春天　你身后有无数的花朵
你的灵魂装着我和你的秘密

赏碟

身后事与谁说

谢 挺

电影改编自艾丽斯·西伯德同名畅销小说，题目多少有些费解，据说是来自主人公苏西身后的一段感悟：一个家庭，犹如人的周身骨骼，即使有一块破损了，缺失了，但骨架终会长全，最后融溶和合。小说是以一个死后的女孩为主角的，电影继承了这个叙述角度。

畅销小说意味着受者众多，但也因此带来了改编的角度，因为很多原作支持者多半会将两种文本进行比照。导演彼得·杰克逊曾执导过《魔戒》、《金刚》，相信这种问题不会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但是否如小说读者的心愿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我们没阅读过小说的人可以绕过去，把电影当做原创。

故事不久，女主角苏西就死了，“1973年我死于谋杀，当时我不到十四岁……”，这似乎是小说惊悚的开头，电影则将它顺后了一些，而花时间帮我们塑造一个可知可感又可爱的小女孩苏西的形象。比如我们知道苏西喜欢扮漂亮，喜欢拍照，甚至在一个月间用光了24卷胶卷。她有一个心仪的男孩作为思慕对象，就在这段朦胧的恋情即将成形时，苏西却落入了坏人设下的陷阱。

但显然这不是个侦破题材，否则死者就该让位，警察就不应缺席——这部电影的华彩无疑是女主角死后世界的描述，给一个被奸杀至死的女童创造一个如此美轮美奂的身后世界当然出自创作者的爱心，但它还是让我想起佛教中的中阴世界，亦即人死后从一个生命体到下一个生命体之间或长或短的停留，我猜至少导演是从中得到过养分的，否则不会选择一个东方人来作为苏西的引路人。在我看来这是向东方文化致敬之举。

苏西的身后世界会随心境改变，或美妙如春暖花开，或严酷如滴水成冰的寒冬，这种情境随心而转变也刚好适合美国大片的特效制作，看上去的确有些震撼。但其余部分，电影显然不专注于破案，事实上从结果看这个案子也并未告破，虽然凶手意外地从一个陡坡坠落而死，却远非“罪有应得”那般痛快——实话说，观影的过程我们还是被导演想全方位照顾的想法弄得疲惫，据说原作是全美很多家庭阅读的对象，电影显然也想达到这个效果，成为一个举家欣赏的艺术品，亡者已去，亲情更重要。但我以为它讲述亲情愈合的过程并不成功，而我们也已经被苏西的身后世界分走了太多的关心，因此到最后颇有些不耐烦，感觉导演要述的东西太多了，就像好好的一碗汤，被他弄成了糨糊。

新书架

《禅心三无》

张 莹

佛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禅心三无”，无忧、无悔、无怨。无忧，就是放下对未来的牵挂、猜测、担心，把握当下；无悔，要珍惜每天的生活，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从而放下对过去悔恨的执著；无怨，就是对我们人生遇到的一切都能喜欢接受，而且心存感恩。禅心三无，就是用一颗禅心去对待生活。那么，以“三无”之心去对待生活是不是太消极了？对弊端、丑恶无怨岂不是放纵罪孽？平常心是不是说一切顺其自然，无须努力？种种问题，明海法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柏林禅寺住持的高僧，会在书里耐心给您一个明白的解答。

随笔

雪花中的追忆

常天义

也许是人过中年后都喜欢怀旧的缘故，好多与雪相融的往事常会映出我的脑海。即便是以往的困惑和失落，每每记起，总会有几多感慨。从少年时代到军旅生涯，一路走来，雪域茫茫，历历在目……

时针拨回到文化大革命年代的1969年3月7日。清晨，军列在胶东半岛的济烟线上飞驰，窗外密集的雪花相送着一棵棵远去的白杨，这是我当兵离家的第二天了。

到军营上的第一堂课，是忆苦思甜。司务长用当时军粮中不多的白面粉，换回老乡的萝卜缨子和不知名的干菜叶，让炊事班用少量的豆杂面，不加调料，不加油盐蒸成菜窝窝食用，每餐如此，连续三天。

那年深冬的一天，我早晨醒来，饥肠辘辘，透过破碎的窗纸，看到院子里枣树枝头几只麻雀在纷飞的雪花中瑟瑟发抖，阵阵寒风不时吹动着这些小生灵的羽毛。我幼小的心多了丝丝寒意。我家头天晚上就已经揭不开锅了，我和大我几岁的姐姐哭着要买东西吃，爹从桌底下一个瓦罐里倒出来仅有的一小捧蒲草根面，捡去老鼠屎，在鏊上烙了一个小饼，分给了我姐俩。那时，家里就没有来钱的门路，哪有钱买吃的，点灯的煤油和食盐，还是等着从鸡窝里掏出来的鸡蛋换来的。

有一次，饿极了，趁着雪夜天黑，我偷偷地钻进了近邻生产队的牛棚，偷偷挂在屋梁头上的红萝卜缨蒂，结果被人发现，挨了骂，丢了人，还被爹狠狠地揍了一顿。那次我没有哭，但爹娘却在暗暗掉泪，如今想起，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那时间，盼的最多的就是来年的开春和秋天。我的家离黄河南岸不到一公里。春季，就可以跑到黄河湿地挖一些被当地称为“水红”的野菜。秋天，刨一些蒲草根，用水洗净晒干，在石磨上磨成面充饥。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的眼里，苦和能吃苦是天注定，和城里人不能比。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期盼有那么一天，进城当工人，永远不再挨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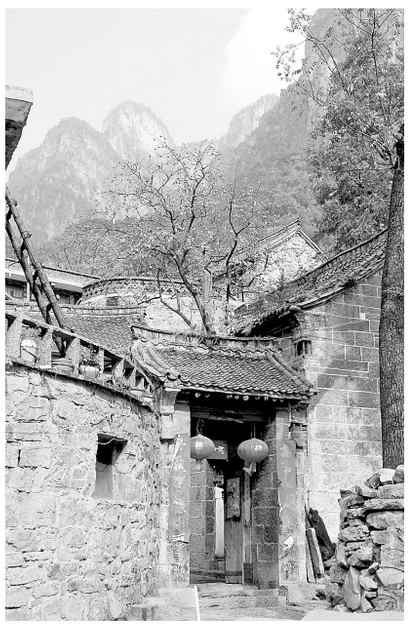
那时乡下没有电，自做小煤油灯，带到课堂早读和晚自习，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中学。没有钱住校，只好每天来回跑十几公里路上学，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冬都是这样。

那时家里没有表，但我从没让家人操过心，凭着生物钟和看天上的北斗星的位置，上学很少迟到过。除了每年用家里六元钱交学杂费外，从中学毕业到走出家门，不曾向家里多要过一分钱。

1970年冬始，在神州大地上，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亿万军民大拉练、大练兵的场景。练“吃、住、走、打”为备战。重点检验部队冬季严寒条件下的生存能力、耐寒能力、适应能力、作战能力。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雪飘落的季节，我们部队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野营拉练。我们是陆军。步兵行军，全靠两条腿。严冬拉练，由于单兵负荷重，路难行，汗水不易挥发，拉练第二天，我和不少战士的脚都磨起了水泡。战士们用针将泡穿透，然后把头发放置其中，让泡内的积液及时流出。这个办法，对行军当日休息的打泡者，不失是一个良方。但连续行军，脚掌上大泡套小泡，新泡套老泡，成了血板脚。行军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以后慢慢麻木了，也就不怎么疼了。那时，战士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平时多吃苦，战时少流血。平时怕吃苦，战时是逃兵。在当时谁若被收容，便会感到莫大的耻辱。

我们部队拉练所在的胶东大地，是战争年代有名的革命老区。部队走到哪里，老乡都会热情迎接子弟兵，让出最好的房屋，扒开草垛，让我们打铺盖。天不亮，房东甚至是六七十岁的老大娘，会抢在我们的前面起床，烧红了灶膛，为我们准备热水。离开时全村人扶老携幼到村头送行。在老百姓村里，打水、扫地，喊大爷、大娘是我们部队的优良传统。起床后先扫地，房东家的水缸总是挑得满满的。当时，虽然我年纪小，但是在连队里还算是个文化人。也就是从那时，我拿起了笔，在完成作训的间隙，撰写了多篇反映全民皆兵、军民鱼水情深的稿件，先后被军队和地方多家媒体采用。也就是在这个年初，我立了功，被破格提了干，续写了生命里长达二十年的当兵历史……

往事悠悠，雪花飘飘。难忘的记忆留在了那很远的地方，也一次次飘落在我的梦境里。



太行人家（摄影） 刘予平

绿城杂俎

值得回味的《趁早歌》

王吴军

人生在世，读书、做人、教子、尽孝等方面都需要用心去做，需要趁早去做，需要抓住时机，以免留下无限的遗憾，这应该是所有的人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清朝的陈其德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叫《趁早歌》，描述了读书、孝顺、教子、积善皆需趁早的人生况味，文笔生动，语言流畅，语重心长，说理细致，坦诚真挚，十分值得一读，更值得细细回味。

陈其德的《趁早歌》是这样写的：“读书须趁早。读书不趁早，后来徒悔懊。精力本易衰，光阴如电扫。见人享荣华，自己唯嗟老。孝顺须趁早。孝顺不趁早，高堂容易老。甘旨尽吾欢，菽水承颜好。一旦恨终天，珍馐总虚渺。教子须趁早。教子不趁早，大来多颠倒。舔犊真可怜，佑启非草草。蒙养是圣功，琢磨全在小。积善须趁早。积善不趁早，趋向已差了。念念贵操持，时时宜探讨。方便在寸心，阴德只嫌少。”

这首《趁早歌》虽然带有一些封建文人和士大夫的唯心主义思想，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以朴实的文字表达了作者珍惜人生、勤勉修身的积极心态，言辞谆谆，意义深远，一片清明如水的宽厚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耐人寻味。

南昌分别后，蒋介石与陈布雷在南京第一次见面。陈布雷说：“蒋先生辛苦了！听说总司令这一路，由南昌、九江直下安庆，3月24日克复南京，底定长江中下游。”

蒋介石说：“3月26日，我去过上海，是到宋子文部长住宅去的。”实际上蒋介石是去会见宋美龄，但是他并未对陈布雷直说。“来去匆匆，3月27日，南京各界在秀山公园广场庆祝北伐胜利，我还去讲了话。”蒋介石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布雷先生，现在局面反而比誓师北伐时难啦！虽然实行了清党，但共党隐患犹在。党内派系分歧，冯玉祥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叫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开过会议。6月19日，冯又与我及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开了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合作，反苏、反共，但是局面还是乱糟糟的，统一不起来。”

陈布雷双目瞪得很大，心中一片糊涂，对于这种派系人事纠纷，他感到头痛，又无什么办法。

作为中央党部书记长，当然要参加中央党部会议。1927年8月初的一次中央党部会议，使陈布雷真是又伤心又苦恼。在这次会议之前，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指挥徐州战役失利，孙传芳取得张宗昌的支持，卷土重来。李宗仁、白崇禧，甚至何应钦，都对蒋介石不满。

蒋介石先发言，检讨徐州战役失利，主要是黔军王天培不听指挥，贻误戎机，致遭失败，言下不胜悻悻。

蒋介石发言完，孙科先开炮说：“蒋先生是不是出国休息一下？”小诸葛白崇禧也发言说：“总司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接着李宗仁、古应芬、邹鲁等人都附议同意。何应钦默然不语。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北伐尚未完成，正在准备继续进行，需要团结一致，蒋介石不能离开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陈布雷听到这里心里宽了许多。但举行表决时，主张蒋介石出国的占多数。蒋介石脸色铁青，陈布雷的心又疾跳起来。

会后，蒋介石回到丁家花园住宅，在房里踱来踱去，陈布雷低声说：“蒋先生如下野，我也想辞职回乡。”

“布雷先生，”蒋介石这时很动感情地说，“你对党国确实忠心耿耿。”说到这里，他吩咐警卫团长王世和说：“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来。”一边又自言自语：“我要问问敬之，为何沉默不发一言，他究竟持何态度？”

何应钦不一会赶到了。蒋介石亲切地问：“敬之，你对白健生（白崇禧）的提议以为如何？”

何说：“既然党中央决定，多数同意中央这个决定，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总司令还是出国一阵子吧。”言毕告辞。

蒋介石深为失望，盛怒之下，命王世和叫警卫师长姚琮来见，一边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和我一起走吧！看他们这班人怎样搞？唉！共产党在南昌暴动，南下潮汕；孙传芳、张作霖在北方，虎视眈眈，看他们怎么办？”

姚琮来到，蒋介石叫姚琮集合全师，跟他回浙江。姚说：“总司令，我的师已经分散，集合不起来。”

蒋怒不可遏，大骂道：“你，混蛋！滚蛋！”骂走了姚琮，又对王世和说：“你赶快集合全团跟我走！”王外出集合队伍，但其中一个营不肯走。

8月13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南京上了火车，陈布雷也上了车。车站上冷冷落落，也没有送行的人，同昔日“热烈欢迎”的情景相比，真是凄凉得很。“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实在太使人心寒。”陈布雷坐在车中默默地望着渐渐远去的紫金山想着。

火车不是专车，而是挂在2点30分开的京沪特别快车上，到达真如车站，已是7点多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警察厅长吴忠信，还有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已在车站恭候。火车一停，马上上车与蒋相见。陈布雷对这些人也是熟悉的。约过了半小时，火车就改挂车头直开杭州，约11点，到了杭州车站。前来迎接的有浙江省府主席张静江，省军事厅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竺鸣涛，他们陪蒋到了湖滨澄庐，陈布雷也被邀同住。蒋介石说：“难得有空，布雷先生，你也与我一起游西湖吧！”

这时，蒋介石的哥哥蒋锡侯在杭州任浙海关监督，也来陪同蒋介石游西湖，岳坟、玉泉、灵隐、天竺都去了。这些地方，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都去过，但这次与蒋介石一起游玩，又是别一番滋味。从三潭印月到蒋庄时，陈布雷介绍说：“这原是廉南湖、吴芝瑛夫妇别墅，别名小万柳堂，后转售于南京人蒋氏，故号称蒋庄。”

4

连 载

庐山刺蒋未成，王亚樵把希望寄托在了南京的行动组身上。

南京行动组是由郑抱真带领的。他们一行四人住在余立奎的仙鹤街住宅内，伺机刺蒋。

6月25日，蒋介石从庐山归来后已一个星期。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的学生依然聚在南京，不愿散去。蒋介石在滔天的怒骂声中，只好答应在中央军校礼堂接见部分学生代表和新闻记者，并发表演说。

此时，郑抱真等四位杀手和负责总联络的王亚樵之妻王亚瑛都混了进去。

由于里面戒备森严，主席台又离人群有一段距离，王亚瑛觉得刺杀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就把头上戴着的白色太阳帽拿了下来，放作胸前。

王亚瑛是负责总联络的，她去掉帽子，就是告诉郑抱真等人“暂缓行动”，郑抱真等人只好停止行动。

“九·一八”后，全国反蒋呼声日高，蒋介石在12月25日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被迫二次下野。王亚樵只好抽回了南京的人马。

刺杀宋子文

1931年7月24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卫士六人，昨(23日)晨7时由京(南京)乘快车抵沪。宋等下车后出月台，入大厅，过讯问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炮、手枪向宋猛射，宋之卫士也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弥漫，此站大厅忽变成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悲，秩序大乱。结果宋氏以身幸免，秘书唐腴胪则身中数弹，于昨日11时30分因伤重殒命……”

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宋子文被刺案。

蒋介石与宋子文认真分析一通，排除了政治谋杀的可能，认为是大亨杜月笙一手策划的。

不久前，蒋介石、宋子文和杜月笙谈成一笔买卖鸦片的生意，协议签好后，杜月笙付了六百万现金给蒋介石和宋子文。杜月笙回到上海把此事告诉了黄金荣。之后，杜月笙变了主意，不愿意再做这笔生意了，于是，他向宋子文讨还钞票。宋子文老大不高兴，但碍于面子又不能不还，就推托手头没有现钱，还给杜月笙六百万元政府债券。

这债券哪里抵得上现金？气得杜月笙恨不能一口吞了宋子文。他找来青红帮枪手“行刺”宋子文，但关照好子弹不能击中宋子文。

杜月笙目的是警告一下宋子文，所以，要了他的秘书唐腴胪的命。

戴笠着手缉拿王亚樵后，很快发现，这起案子又是王亚樵的杰作。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内幕，戴笠当时也没弄清，直到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

且说王亚樵庐山、南京连刺蒋未成功后，心中甚觉得对不起“西南派”的人。此时，王亚樵的故交、粤系国民党中监委萧佛成、马超俊又带来四万元，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

“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如同掐断蒋的血管。”萧佛成对王亚樵说。

王亚樵刺蒋未成，心中十分惭愧，现在听说需要刺杀宋子文，觉得倒也是一着围魏救赵之棋，并且可以杀鸡儆猴。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说。宋子文官至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并外交委员，又身为“大国舅”，且与美国人关系十分密切，是地地道道的政府“一把手”。

王亚樵受领新任务后，当即在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秘密布置。

此次行动方案，依然是分两组同时行动。一组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二组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了上海北站附近的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

当时，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天即自宁返沪，再于下周一自沪去宁办公。

郑抱真在离京呆了两个星期后，摸准了宋子文的行动规律。他和王亚樵认为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动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

上海八仙桥附近有一家“和平米店”，是王亚樵出资八千元经费开的，专营淮北船帮贩运的大米，赚了钱作为新成立的“铁血锄奸团”的经费，郑抱真公开的身份即是此米店的老板。他的手下几名伙计中，有一名叫做“小泥鳅”，此人极为活跃机敏，已经打入蛇口的清帮之中，并与日本浪人秘密来往。

为了刺杀宋子文，郑抱真便派小泥鳅去购置烟幕弹。小泥鳅在清帮头子常玉清的兄弟的协助下，用八百元的代价从日本浪人手里弄来了一枚秘制烟幕弹。

在小泥鳅购烟幕弹时，发现还有二枚。经过小泥鳅伶牙俐齿的套近乎，得知这两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在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

12